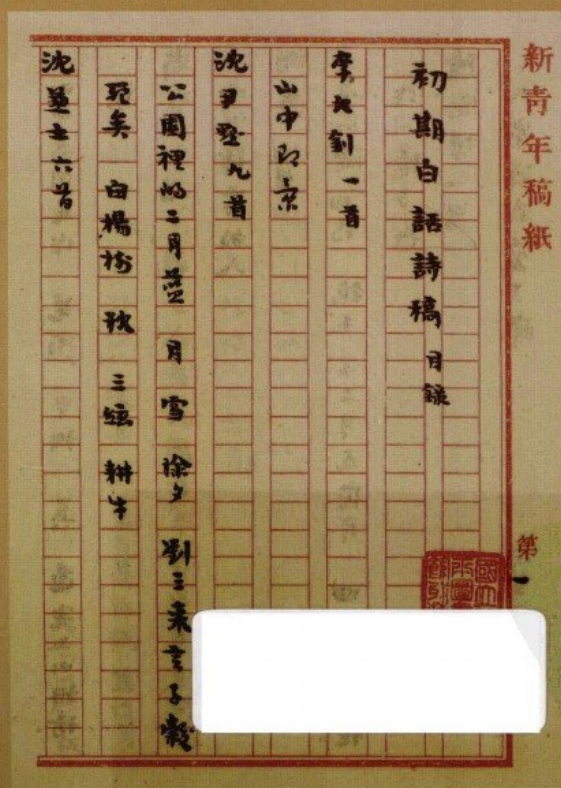


北大中文學刊

2012

北京大学中文系 編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北大中文學刊

2012

北京大学中文系 編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北大中文学刊. 2012/北京大学中文系编.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 1

ISBN 978-7-301-21802-0

I. ①北… II. ①北… III. ①文学理论-文集②语言学-文集③文献学-文集

IV. ①I0-53②H0-53③G25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304398 号

书 名: 北大中文学刊(2012)

著作责任者: 北京大学中文系 编

责任编辑: 李 凌 徐丹丽 张雅秋 张弘泓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21802-0/G · 3553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新浪官方微博:@北京大学出版社

电子信箱: zpup@pup.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3374

出版部 62754962

印 刷 者: 北京大学印刷厂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787 毫米×1092 毫米 16 开本 45.75 印张 905 千字

2013 年 1 月第 1 版 201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98.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信箱: fd@pup.pku.edu.cn



编辑说明

“春华”未必“秋实”，作为现代学人，我等不能不既讲耕耘，也问收获。不仅收获，还得学会“广而告之”。为了向中外学界汇报业绩，也为了自我鼓励，北京大学中文系决意创办《北大中文学刊》。

学刊年出一卷，选录同仁过去一年间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不定名额，无论长幼，更遑论原刊何处，凡北大中文系在岗教师，每人均可提交一文送审。能通过校内外专家匿名评审者，即予以收录。

学刊所收文章，一律注明出处，原则上不做修改（错别字除外）。各文的编排，注重专题性，而不是所属单位。书后附列同仁在过去一年出版的著作目录（或新刊，或增订再版）。

之所以人限一篇，主要还不是篇幅限制，而是提倡“精雕细刻”。每年有一篇自家满意的“好文章”发表，在我看来，已属难得。

尊重同仁的个性、趣味及自我期许，不强求一律。再说，学刊并非高下立判的“擂台”，而是自我展示的“橱窗”。我们的愿望是，有更多同仁所撰“宏文”，因此而长上翅膀，飞向更加辽阔的世界。

现代学术讲究“专业性”，同在中文系教书，却也面临“隔行如隔山”的尴尬。平日里各自忙碌，难得关注同事的工作。这册学刊，将迫使同仁进入“跨学科”对话状态。若能因此而增进同事之相互了解，乃至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则幸甚。

2009年8月13日

目 录

作为书面语的晚清报刊白话文·····	夏晓虹(1)
无声的“口语”	
——从《古诗今译》透视周作人的白话文理想·····	张丽华(16)
《点石斋画报》中的西人识宝传说·····	王 娟(32)
早期北京大学与传统经学的近代转型	
——晚清民初经学探研录之一·····	吴国武(42)
“老实说了吧”前后:1920年代文坛上的“导师”与“青年”之争·····	姜 涛(55)
古典语境在现代文学中的移植	
——何其芳对中国古代志异文本的改写·····	吴晓东(73)
斯诺的红色中国梦	
——重读《红星照耀中国》·····	秦立彦(85)
光复初期台湾文学与文化现象的对抗式论述·····	计璧瑞(92)
重评鲁迅阐释史上的一件往事	
——耿庸的《〈阿Q正传〉研究》对冯雪峰《论〈阿Q正传〉》的批评·····	王丽丽(101)
革命与“乡愁”	
——《红旗谱》与民族形式建构·····	贺桂梅(123)
《周扬同志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纲要〉讨论会上的讲话记录	
(一九六二年十一月三日下午)》的两个版本·····	商金林(149)
陈寅恪《论〈再生缘〉》、《柳如是别传》的研究旨趣·····	廖可斌(169)
我们的历史	
——巴尔特书写的中国·····	车槿山(184)
当代文学批评:问题与挑战·····	陈晓明(191)
面对网络文学:学院派的态度和方法·····	邵燕君(205)
永远的“笛吹弦诵”	
——关于西南联大的历史、追忆及阐释·····	陈平原(216)
齐地早期方仙信仰的文化考察·····	刘玉才(242)

试论《庄子》“三言”的政治性	柳春蕊(253)
盛唐“齐梁体”诗及相关问题考论	杜晓勤(262)
《岳阳楼记》“越明年”考释	
——兼论滕子京重修岳阳楼之年份	杨荣祥(275)
琴曲《秋鸿》作者考辨并及南宋浙派古琴源流	王 风(278)
“文君听琴”的文学意义	
——元代才子佳人戏的恋爱模式	黄 卉(293)
孔尚任艺术鉴藏与文学创作之关系考论	
——以新见孔氏题陈洪绶《饮酒读书图》跋文为缘起	潘建国(301)
论文人书法	龚鹏程(317)
论章学诚在文学史学上的贡献	钱志熙(330)
状元杀和尚:一个陌生故事的四次演述	
——从情节增加引起的主题变化	陈泳超(345)
试论古代小说中的“功能性物象”	李鹏飞(362)
中国寓言研究反思及传统寓言视野	常 森(375)
中国古代小说的叙事学研究反思	刘勇强(394)
我对“国际 Sinology”学术性质的再思考	
——关于跨文化学术视野中“国际中国经典文化研究”	
基本特征的研讨	严绍璎(409)
从“汉籍”到“域外汉籍”	王 勇(418)
什么“世界”? 如何“文学”?	陈跃红(425)
The Transcendental Dimension of the Age of Disenchantment: The Paradox of Religion in the Contemporary Context of China	杨煦生(434)
试论文学形式的解释学意义	张 辉(443)
莎士比亚英国历史剧的创作意图	张 沛(452)
卢伯克的“形式思想”:重读《小说技巧》之前四章	蒋 晖(464)
宽式语形:汉诗意境形成的诗学根源	陈保亚(480)
动结式中结果补语隐现的句法和语义条件	沈 阳 魏 航(496)
“差点儿”和“差不多”的意义同异之辨	袁毓林(509)
谐声字族和汉语双字构词的一项限制条件	叶文曦(522)
语音对应的两种放宽模式及其后果	
——以彝白比较为例	汪 锋(533)

从语义类推的新类型看其认知本质、动因及其他问题	朱 彦(566)
现行常用汉字构形属性分析	万艺玲(582)
扬雄《方言》与方言特征词的判定问题	
——以《方言》部分方言词的重复注释为例证	孙玉文(597)
论知组、庄组、章组声母在近代汉语早中期的演变类型	张渭毅(606)
《生经》及相关经本之勘正	胡敕瑞(639)
《本草衍义》版本源流考	陈晓兰(647)
真山民其人其集考	王 岚(666)
日藏宋僧诗集《一帆风》相关问题之我见	许红霞(683)
金元平水注疏合刻本研究	
——兼论注疏合刻的时间问题	顾永新(699)

作为书面语的晚清报刊白话文^①

夏晓虹

作为现代白话文的前身,晚清白话文的重要性不容忽视。但长期以来,为“五四”划时代的光芒所遮掩,晚清白话文黯然失色,很少受到学界关注。这与其时白话书写史无前例的繁盛极不相称。

所谓“繁盛”,就文本载体而言,晚清白话文主要存在于报刊。虽然 1876 年 3 月 30 日申报馆最早发行的第一份白话报纸《民报》很快夭折,但总数达到两百多种的白话报刊^②,在晚清启蒙思潮中,仍然成为引领风尚、对社会大众最具影响力的白话读物。加以文言为主的报刊亦不乏开辟白话文栏目者,到 20 世纪初,报刊中的白话书写已堪称声势浩大。而以通俗为准则,方言写作的分量也日益加重。由此构成的官话与非官话区方言的交错,构成了晚清报刊白话文的丰富图景。

“手”与“口”的关系

晚清关于白话文学最有名的一句话出自广东嘉应州(今梅州)人黄遵宪。1868 年,时年 21 岁的黄遵宪作《杂感》诗,中有“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③之句,经过胡适的引述、发挥^④,此语几成为对于白话文学最精准的概括。

1898 年 5 月 11 日,无锡人裘廷梁联合同志,创办了《无锡白话报》(自 6 月 19 日第 5、6 期合刊起,改名《中国官音白话报》)。8 月 27 日出刊的 19、20 期合刊上,刊登了裘氏的名文《论白话为维新之本》,赫然提出“崇白话而废文言”的主张,指责文言使“一人之身,而手口异国,实为二千年来文字一大厄”,结语为:“文言兴而后实学废,白话行而后实学兴;实学不

① 本文系作者提交给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于 2011 年 5 月 7—8 日举办的“汉语书面语的历史与现状”学术研讨会之论文。

② 参见胡全章《清末民初白话报刊研究》,第 20 页,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后研究报告,2010 年。

③ 黄遵宪:《杂感》其二,黄遵宪著、钱仲联笺注《人境庐诗草笺注》上册,第 42 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1 年版;另参见钱仲联:《黄公度先生年谱》,同书下册,第 1173 页。

④ 参见胡适《五十年来之中国文学》,第 34—38 页,上海:申报馆 1924 年版。

兴,是谓无民。”此文先是作为1901年裘廷梁编辑的《白话丛书》第一集代序印出,后又于1903年收入梁启超在日本横滨出版的《清议报全编》之《群报撷华》卷,因而产生了相当广泛的影响。

以上两例早已是学界常识。不过,在裘廷梁之论见报前,1898年7月24日,创刊于上海的《女学报》第一期上,却尚有未被研究者道及的《上海〈女学报〉缘起》。作者上海女士潘璇乃是这份中国最早的女报主笔之一,其文第一节“论用官话”,已经在辨析“这文字是手里的话,言语是嘴里的话,虽是两件事情,却是一样功用”。她的结论是:“古话除考古外,没有别用。不如用白话的易读易晓,可以省却那些无限的工夫,好去揣摩这些有用的实学。”由于裘廷梁办《无锡白话报》所倚重的从侄女裘毓芳亦在《女学报》第一批公布的主笔名单上,因此,裘廷梁的白话论极有可能受到了潘璇的启发。

有意思的是,三人关于文言与白话关系的早期思考,都不约而同地提到了“手”与“口”的分离与合一。“手口异国”的文言书写既被视作大害,手口如一自然也就成为白话写作的最大好处与特征。而就其言说与立场的坚定来看,论者显然并不以为“手”“口”统一有何难处。以此推想,无论是1905年病逝的黄遵宪,还是1943年才谢世的裘廷梁,都应有白话文传世。尤其是后者,以其提倡之早、鼓吹之力,白话著述更应数量可观。不过,翻检各家文集,结果殊出意外。

在目前收录最全的《黄遵宪全集》^①中,除了被胡适称赞的辑录当地民歌而成的《山歌》等作品外,并没有一篇白话文。最接近的是1898年2月21、28日,黄氏任湖南代理按察使时,在长沙南学会的两次演讲稿^②。此稿于《湘报》发表时,称为“讲义”。起始虽也使用了“诸君,诸君”这样开讲的套语,但通篇所用文体仍属浅近文言。如第一段:

诸君,诸君!何以谓之人?人飞不如禽,走不如兽,而世界以人为贵,则以禽兽不能群,而人能合人之力以为力,以制伏禽兽也,故人必能群,而后能为人。何以谓之国之为一省一郡,又分之为一邑一乡,而世界之国只以数十计,则以郡邑不足以集事,必合众郡邑以为国,故国以合而后能为国。

不过,比较其他演讲者,如陈宝箴、谭嗣同、皮锡瑞等,黄遵宪的讲稿已算是最具现场感。除了开篇与另外两段开头使用的“诸君,诸君!”外,文中也随处提到“诸君”,并有“嗟夫!嗟夫!”的感叹,最后则以“诸君,诸君!听者,听者!”^③结尾。总之,通过保留或添加此类呼唤与感叹,黄遵宪确实是在有意制造或复原同听众交流的临场氛围。只是,其讲义与白话文仍有间隔。

① 陈铮编:《黄遵宪全集》,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版。

② 参见《开讲盛仪》,《湘报》第1号,1898年3月7日。

③ 《黄公度廉访南学会第一、二次讲义》,《湘报》第5号,1898年3月11日。

裘廷梁的情况比较复杂。可以认定的是,在主持《无锡白话报》(《中国官音白话报》)期间,裘氏唯一以本名发表的文章即是《论白话为维新之本》,而此文乃出以文言。当然,这并不排除他可能用笔名进行白话写作,而且,起码一些未署名的文字确实出自裘廷梁之手^①。不过,1901年出版的《白话丛书》第一集中所收六种白话著作^②,全部记为裘毓芳“撰”或“演”。裘廷梁87岁去世前编定的《可桴文存》,也以文言著述为主;特别列出的“白话文”一类,仅得13篇,且目前排在首位的《致梁任公信》,写作时间已迟至1922年^③。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裘氏1936年2月刊出的《国粹论》,是其晚年十分看重的论文。按照裘廷梁自陈,此篇“初意欲作白话文,不果”,后由其从侄孙裘维裕译成白话,并不避重复,特别作为《可桴文存》的“白话文”附录印出^④。

由上述叙述透露出的信息是,白话书写对于黄遵宪和裘廷梁也并非轻而易举,特别是裘氏自认相当重要的文章,仍要假手他人而非自撰成白话文,其间必有为难处。激烈主张“手”“口”合一的人,自己却无法践行其说,所以致此的原因何在?

首先可以想到的自然是书写习惯。文言作为统一的书面语,早已成为读书人自我表达与文字交流的通用媒介。假如没有经过一定的训练,写作白话文并不一定比撰写文言文更便捷,甚至可能费时更多。1902年,梁启超翻译法国小说家焦士·威尔奴(Jules Gabriel Verne,今译“儒勒·凡尔纳”)的《十五小豪杰》一例堪称经典。梁氏当时自道甘苦:“本书原拟依《水浒》、《红楼》等书体裁,纯用俗话,但翻译之时,甚为困难;参用文言,劳半功倍。”这显示出,对于熟习文言写作的人,骤然调换笔墨,情形很有些“欲速则不达”的尴尬。而其“每点钟仅能译千字”的白话书写,若与以文言翻译小说出名的林纾相比,则林氏“日区四小时,得文字六千言”的高速率,实足令人惊叹;即使自我比较,在改用文白夹杂体后,梁启超更将每小时译出的字数提高到“二千五百字”。^⑤可见,写作习惯同样应是黄遵宪与裘廷梁自由使用白话的一大障碍。

另外一个也许是更重要的原因,则是各人的方言背景。本来“我手写我口”,只能指向方言写作。但在黄遵宪、裘廷梁、梁启超等人当年看来,采用白话文原本就是要达到通行全国、启蒙大众的目的,如果只限于方言区一隅,便折损了写作的意义。因此,官话成为必然的选

① 如第1期“无锡新闻”中《亚洲废物》一则,用“本馆主人”自述的口气,作者明显为裘廷梁。本文所用《无锡白话报》(《中国官音白话报》)复印件由沈国威教授提供,特此致谢。

② 包括《〈女诫〉注释》、《农学新法》、《俄皇彼得事略》、《日本志略》、《印度记》与《海外拾遗》。

③ 信中提及“听见你担任东南大学讲席,并且常往南京各校演讲”(《可桴文存》,第96页,无锡:裘翼经堂,1946年),与梁启超1922年10月下旬起在南京东南大学讲学事合(见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967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可桴文存》复印本由胡晓真研究员提供,特此致谢。

④ 裘可桴:《〈可桴文存〉自序》,《可桴文存》卷首。《国粹论》的刊载时间见《致吴观蠡》(《可桴文存》,第113页)。

⑤ 少年中国之少年(梁启超):《十五小豪杰》第四回批语,《新民丛报》第6号,1902年4月;林纾:《〈孝女耐儿传〉序》(1907年),阿英编:《晚清文学丛钞》(小说戏曲研究卷),第251—252页,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版。

择。潘璇为《女学报》所作序中,已经把这层意思说得十分清楚:

我中国通行的,有这官话。“官”字是公共的字,“官话”就是公共的话了。我们如今立报,应当先用官话,次用土话。为什么呢?因为土话只能行在一乡一村的,不能通到一县一州;行在一县一州的,不能通到一省一国。本报章定用官话,乃是公共天下的意思。^①

这也是《无锡白话报》改名《中国官音白话报》的缘由:“以报首标明‘无锡’二字,恐阅者或疑专为无锡而设,尚虑不足以号召宇内。”^②当然,随着白话启蒙运动的深入,日后对于以官话统一人心、增强国力一类政治层面的意涵有更多的论述。

在以官话为标准的白话文书写理念引导下,生活在北方话之外的方言区作者的情况便值得格外关注。如黄遵宪为客家人,所用日常口语为粤东客家话;裘廷梁籍贯无锡,属于吴语方言区;梁启超则为广东新会人,正处于粤语区内。自然,出于科考、仕宦等缘由,必须奔走在外的士人也一定要学说官话。但对于非北方话地区出身的读书人来说,先入为主的方言总是会成为日后断续习得的官话的羁绊,与北方话音韵、词汇差别越大的地区,官话越难写得顺畅。据说梁启超戊戌变法中被光绪皇帝召见,本拟加以重用,但后来“仅赐六品顶戴”,“仍以报馆主笔为本位”,个中原因是,“传闻因梁氏不习京语,召对时口音差池,彼此不能达意,景皇(按:即光绪帝)不快而罢”。^③而例举其音,则梁读“孝”字为“好”,读“高”字为“古”,让说着道地北京话的光绪帝如何明白。虽然梁启超晚年往来密切的弟子杨鸿烈记述,“后来,因梁氏常与外省人周旋接触,新会乡音便逐渐改变”,但还是认为,“事实上,全国大多数听众都以不能完全明了他的西南官话为憾”。并举例说,“尤其在华北方面,如一生最崇敬他的前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务主任兼史学教授王桐龄氏,凡有梁氏的讲演,几乎风雨无阻,每次必到,但总是乘兴而往,怏怏而归。问其所以,总是自认对于讲词的某段某节,竟完全听不明白”。^④由此我们也可以知道,梁启超尽管日后学会了西南官话,在交流上仍存在困难。特别是时当晚清,其浓重的乡音,必然会影响到他的官话白话文书写。

因此,下文拟从晚清报刊中选取若干文本,通过仔细比对,考察处在文言与其他方言夹缝中的官话白话文与各方的纠葛,以呈现晚清白话文的多种面貌,并探测其成因及演化趋势。

文言与白话的同出一手

如上所述,晚清的现实情境是,文言与白话的壁垒,使得大部分未经训练的读书人很难

① 潘璇:《上海〈女学报〉缘起》,《女学报》第1期,1898年7月24日。

② 《本馆告白》,《无锡白话报》第4期,1898年5月25日。

③ 王照:《复江翊云兼谢丁文江书》(1929年),夏晓虹编:《追忆梁启超》,第183页,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年版。

④ 杨鸿烈:《回忆梁启超先生》,同上书,第287页。

在两者之间自由转换。因翻译《十五小豪杰》时,“明知体例不符”,但为“贪省时日,只得文俗并用”,梁启超不由发出了“语言、文字分离,为中国文学最不便之一端,而文界革命非易言也”^①的慨叹。梁氏的粤语背景,固然也制约了其纯熟写作官话的能力。但即便是北方官话区的作者,初次试笔白话文,也仍然可能文白掺杂,写得四不像。例如,1905年12月,一位天津的读者向英敛之主编的白话报《敝帚千金》投稿,其中说到自己勉力执笔的情况:“我今天把几年的愚志宣一宣,奈白话的文理虽浅,狠难说得有味。愚素日既未学过,如今又无人指教,不得不任笔写来,不免遗笑方家。”^②虽则为了劝导大众的爱国思想,积极响应国民捐的号召,作者也调整了文笔,努力写作白话文,但其中随处可见的文言字眼,特别是把口语中常见的“说一说”或古白话中常用的“表一表”,十分别扭地写成了“宣一宣”,读来的确引人发笑,倒也由此可见晚清白话文作者的启蒙热情之高。

而在清末众多的白话报刊中,若与五四文学相系联,陈独秀1904年3月31日在安徽芜湖创刊的《安徽俗话报》于是具有了特别的意义。陈独秀为安徽怀宁(今属安庆)人。关于该刊所用的语言,第一期揭示宗旨的《开办〈安徽俗话报〉的缘故》已作了说明,“做报的都是安徽人,所说的话,大家可以懂得”。也就是说,主笔陈独秀所写的白话文,乃是“下江官话”(江淮官话),属于晚清官话的体系内。

应该承认,陈独秀对语言、文字有特殊的敏感与兴趣,他在《安徽俗话报》上发表过《国语教育》一文,很早就提出了“国语”的概念。他认为,国语教育意义重大,其中一个理由便是可以统一语言——“全国地方大得很,若一处人说一处的话,本国人见面不懂本国人的话,便和见了外国人一样,那里还有同国亲爱的意思呢”。其中也讲到安徽内部的方言情况:“就说我们安徽省,安庆、庐州、凤阳、颍州、池州、太平这六府的话,虽说不同,还差不到十二分。惟有徽州、宁国二府的话,别处人一个字也听不懂。就是这二府十二县,这一县又不懂得那一县的话。”所以,陈独秀劝告“徽、宁二府的人,要是新开学堂,总要加国语教育一科”,起码“要请一位懂得官话的先生,每天教一点钟的官话”。显然,隶属安庆府的陈独秀,在语言上已先天地占有会讲官话的优势。陈氏更希望的是,“用各处通行的官话,编成课本,行销各处”。^③由此看来,他在《安徽俗话报》的白话写作,也应以此为目标。

当然,除了语言,其时给予陈独秀官话书写以深刻影响的还有文本。由于陈氏留下的早年生活自述资料很少,我们现在无法准确还原其阅读经验。不过,至少可以知道的是,近则有其“都看见过”的《中国白话报》、《杭州白话报》、《绍兴白话报》、《宁波白话报》、《潮州白话报》、《苏州白话报》^④,陈氏曾参与编辑的《警钟日报》也发表过白话论说;远则有其喜欢的

① 少年中国之少年(梁启超):《十五小豪杰》第四回批语。

② 津门张鸿钧:《劝上国民捐》,《敝帚千金》第9册,1905年12月29日。

③ 三爱:《国语教育》,《安徽俗话报》第3期,1904年5月15日。

④ 三爱:《开办〈安徽俗话报〉的缘故》,《安徽俗话报》第1期,1904年3月31日。

白话小说,如断言文学史价值远在归有光、姚鼐古文之上的《水浒传》与《红楼梦》,认为“文章清健自然”远超《红楼梦》而更为其看好的《金瓶梅》,以及“文笔视聊斋自然得多”而最得其喜爱的“札记小说”《今古奇观》。^① 凡此,都有可能在陈独秀写作白话文之际,成为其经验世界中先在的样本。而这种白话文学的修养,也使陈氏在《安徽俗话报》上刊载的白话文,较之同时代其他作者多了一份自然。

恰好,陈独秀留下了一文一白两篇同样题为《论戏曲》的文章,可以供我们观察其如何出入两种文体。其中,白话本发表在1904年的《安徽俗话报》^②上,文言本见于1905年的《新小说》^③。《新小说》由梁启超1902年11月在日本横滨创办,此时,杂志已改由上海广智书局发行,撰稿的主力也以上海作家为主。

很容易看出,白话本《论戏曲》比文言本多出了一些内容。主要是最后一段对于上海热心戏曲改良的演员汪笑侬的推许:“听说现在上海丹桂、春仙两个戏园,都排了些时事新戏。春仙茶园里有个出名戏子,名叫汪笑侬[依]的,新排的《桃花扇》和《瓜种兰因》两本戏曲,看戏的人被他感动的不少。”因此提出:“我很盼望内地各处的戏馆,也排些开通民智的新戏唱起来。看戏的人都受他的感化,变成了有血性、有知识的好人,方不愧为我所说的世界上第一大教育家哩!”这一段基于陈独秀在上海的观剧体验,对于内地的白话读者而言会感觉言之亲切,而放在通篇采用宏阔视野的文言论述中,则显得气魄不足,煞不住尾。这也是白话与文言一更近乎日常、一更讲究文章作法的不同追求所造成。

同黄遵宪一样,陈独秀在白话本的《论戏曲》中,也不断与读者打招呼;而且受到其时已经盛行的演说风气的熏染,这些原本写在纸面上的文字,也在极力模拟演讲的口吻。文章是这样开头的:

列位呀!有一件事,世界上人没有一个不喜欢,无论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个个都诚心悦意,受他的教训,他可算得是世界上第一大教育家。却是说出来,列位有些不相信,你道是一件什么事呢?就是唱戏的事啊!列位看《俗话报》的,各人自己想想看,有一个不喜欢看戏的吗?我看列位到戏园里去看戏,比到学堂里去读书心里喜欢多了,脚下也走的快多了,所以没有一个人看戏不大的被戏感动的。

如果以语意为单位,上引文字中,几乎每一语意句中,都有一个“列位”在。如此一再被呼唤的“列位”读者,自然也很容易亲近作者,迅速融入论说的情境。而且,大量使用提问句,也是晚清白话文写作的一个诀窍。特别是在模拟演说的白话论说文中,提问句的插入,也有助于

① 见胡适《文学改良刍议》文末之独秀识语、“通信”栏中独秀《答胡适之》,《新青年》第2卷第5号、第3卷第4号,1917年1月1日、6月1日。

② 三爱:《论戏曲》,《安徽俗话报》第11期,1904年9月10日。

③ 三爱:《论戏曲》,《新小说》第2年第2号,1905年3月。

建构一种虚拟的作者与读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当然,晚清许多白话报的编写者,已经有意识地提倡一报两用,打通耳目,兼供阅读与宣讲。^①因而,这些纸面上的文字,也有可能以声音的方式抵达听众的耳中。

而对于白话文非常重要的拉近作者与读者关系的言说方式,在文言文中显然并不那么必要。《论戏曲》改为文言后,与之相对应的文句已相当简括:“戏曲者,普天下人类所最乐睹、最乐闻者也,易入人之脑蒂,易触人之感情。故不入戏园则已耳,苟其入之,则人之思想权未有不握于演戏曲者之手矣。”文中不但掺入了“思想”这样源自日本的新名词,而且也以人类共同的经验取代了白话文中有意唤起的个体感受。当然,文言本也并非只有对白话本的缩写,偶尔也会出现添加。如紧接前引文字有如下数言:“使人观之,不能自主,忽而乐,忽而哀,忽而喜,忽而悲,忽而手舞足蹈,忽而涕泗滂沱,虽些少之时间,而其思想之千变万化有不可思议者也。”这些文句其实都是从“没有一个人看戏不大的被戏感动的”生发出来。而铺陈感动的情状,则是文言的拿手好戏。四字词的纷至沓来与排比句的使用,合力构成了文章的铿锵气势。

更能见出陈独秀在文白之间熟练游走的例句,还是那些字句基本对应的古文今译。不过,这里的工作程序也许刚好反过来,即先有了白话文,再改写成文言文。如下列文句:

依我说起来,戏馆子是众人的大学堂,戏子是众人大教师,世上人都是他们教训出来的。

由是观之,戏园者实普天下人之大学堂也;优伶者实普天下人之大教师也。

现在国势危急,内地风气,还是不开。各处维新的志士设出多少开通风气的法子,像那开办学堂虽好,可惜教人甚少、见效太缓;做小说,开报馆,容易开人智慧,但是认不得字的人,还是得不着益处。我看惟有戏曲改良,多唱些暗对时事、开通风气的新戏,无论高下三等人,看看都可以感动,便是聋子也看得见,瞎子也听得见,这不是开通风气第一方便的法门吗?

现今国势危急,内地风气不开,慨时之士,遂创学校,然教人少而功缓。编小说,开报馆,然不能开通不识字人,益亦罕矣。惟戏曲改良,则可感动全社会,虽聋得见,虽盲可闻,诚改良社会之不二法门也。

文言文中照样使用了新名词,进入白话文则进行了适当的“翻译”或改写,如“学校”之统一为“学堂”,“全社会”之改为“无论高下三等人”,另一处的“改良社会”则意译为“开通风气”,既不失其新意,两边的文字又都显得相当妥帖。

^① 参见李孝悌:《清末的下层社会启蒙运动:1900—1911》,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陈独秀本人也很看重演说,就在《论戏曲》中,他还要求“戏中夹些演说”(《安徽俗话报》第11期)。

考证历史、引用典故本来也是文言文的常见作法,同时也是文人习气的表征。陈独秀面对的读者尽管包括了“没有多读书的人”^①,但他写起白话文来,仍免不了追源溯流、引经据典。《论戏曲》中也有这类文字。其中考察戏曲渊源的一段最为重要:

即考我国戏曲之起点,亦非贱业。古代圣贤,均习音律,如《云门》、《咸池》、《韶护[濩]》、《大武》等之各种音乐,上自郊庙,下至里巷,皆奉为圭臬。及周朝遂为雅颂,刘汉以后变为乐府,唐宋变为词曲,元又变为昆曲,迄至近二百年来,始变为戏曲。故戏曲原与古乐相通者也。……孔子曰:“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孟子曰:“今之乐犹古之乐也。”戏曲即今乐也。

这一段考论有意改变当时国人鄙视戏曲的观念,故将今日戏曲的源头上溯至三代古乐,且引古代圣贤增重之,以此提高戏曲的地位,最终的目的则在借助戏曲改良社会。这样重要的论述思路,在白话文中自然也应予保留,其言如下:

就是考起中国戏曲的来由,也不是贱业。古代圣贤,都是亲自学习音律,像那《云门》、《咸池》、《韶护[濩]》、《大武》各种的乐,上自郊庙,下至里巷,都是看得很重的。到了周朝就变为雅颂(就是我们念的《诗经》),汉朝以后变为乐府,唐宋变为填词,元朝变为昆曲,近两百年,才变为戏曲。可见当今的戏曲,原和古乐是一脉相传的。……孔子常道:“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孟子也说过:“今之乐犹古之乐也。”戏曲也算是今乐。

像《云门》之类上古乐舞,逐一解释,既费篇幅,也不容易说清,索性列出名目,含糊过去,也无碍了解大意。至于尚在众人闻见范围内、却未必都能准确理会的典故,如“雅颂”与《诗经》的关系,则不妨给出说明(虽然其中少了“风”,使二者并不对等),因《诗经》虽未必读过,“四书五经”总该是知道的。至于出自孔孟圣贤的经典文字,便只是照抄,不做通俗化处理,还是无意中透露出陈独秀其时对儒学仍持有相当的尊重。可以想象,这样的引文进入演说场中,依然需要再解说。

凭借个人的阅读积累,依托官话区的方言优势,陈独秀实现了在文白之间的从容转换,以一人之手,而使文言与白话书写各臻其妙。而其文言文也已非传统古文所能范围,其中夹杂的诸多外来词,标记出陈文与大量使用新名词的梁启超“新文体”^②之间的关联。而他的白话文又能够完美地传达出其新体古文的所有成分,由此提前验证了陈本人1917年的论断:“吾辈有口,不必专与上流社会谈话。人类语言,亦非上流社会可以代表。优婉明洁之情智,更非上流社会之专有物。”^③白话在陈独秀手下,正有可供驰骋的无限广阔天地。

① 三爱:《开办〈安徽俗话报〉的缘故》。

② 参见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第142页,上海:中华书局1921年初版、1925年6版。

③ 独秀:《答陈丹崖》(新文学),《新青年》第2卷第6号,1917年2月1日。

官话与非官话区方言的歧出

为了叙述的方便,依照晚清作者书写的差异,大致可将其时的白话文分为官话与非官话区方言两类。而无论哪一区域的作者,真要做到“我手写我口”,只能使用纯粹的方言(包括官话)。极端的例子,比如吴稚晖1896年发明了“豆芽字母”,“以拼音字母,拼写乡音俗语,以代字母,使文盲可以据以代语”,“并教家人试学‘豆芽字母’,以为通讯工具”。^① 吴夫人袁氏是文盲,但学会了这套字母,在吴稚晖去法国时,“夫妻之间就用这种‘豆芽字’作为通信工具,积累起来的信纸有半寸厚”^②。就“达意”而言,不识字的人也可以借助拼音沟通,这样的写作也算得上是手口如一了。

而正如前文所指出的,晚清白话文的提倡者,并不仅满足于“辞达而已”,更抱了一种通行全国的宏愿,以求最大限度地发挥文字的启蒙功效。因此,裘廷梁办在无锡的白话报,也放弃了更为方便的吴语,而致力于官话写作。操着无锡口音的人如何撰写官话文章,或者说,无锡话是怎样被改造成了官话,于是值得关注。吴芙的《女诫》俚语本中的一段文字,与裘毓芳的《〈女诫〉注释》吴芙序,恰好提供了相映成趣的两个文本。

裘毓芳(1871—1902)字梅侣,为裘廷梁的从侄女。在《无锡白话报》创办前,为预作准备,曾遵叔父之命,“以白话演《格致启蒙》”^③。迨杂志创刊,又担任编务。裘毓芳亦为《无锡白话报》最重要的撰稿人,每期杂志上必载其文,少则一种,多则四种。除《〈女诫〉注释》外,裘氏还在该刊发表了《孟子年谱》、《海国妙喻》、《海国丛谈》、《海外拾遗》、《俄皇彼得变法记》、《日本变法记》、《化学启蒙》、《印度记》等。因此,《白话丛书》第一集除刊印于卷首的裘廷梁《论白话为维新之本》,其他著作均出其手。1902年6月21日,裘毓芳因传染时疫去世^④,年仅32岁。

裘毓芳所作《〈女诫〉注释》自1898年5月20日起,在《无锡白话报》第3期连载,吴芙的《班昭〈女诫〉注释·序》即在此期刊出。而吴芙(1889—1873)其人实为吴稚晖之女^⑤,

① 杨恺龄:《民国吴稚晖先生敬恒年谱》,第19页,台北: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吴稚晖则自称于乙未年(1895)“依了《康熙字典》的等韵,做成一副豆芽字母”(吴敬恒:《三十五年来之音符运动》,庄俞编:《最近三十五年之中国教育》卷下,第30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31年版)。

② 蒋术:《吴稚晖和他的一家》,《卢湾史话》第四辑,第34页,政协上海市卢湾区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印,1994年。据蒋文记述,这些信“回国后一直保存在环龙路志丰里10号寓所。到了‘文化大革命’时,被‘红卫兵’抄家搜查出来,说它是秘密文件,有的说是‘妖书’,一起撕毁烧掉”。

③ 裘廷梁:《〈无锡白话报〉序》,《时务报》第61册,1898年5月20日。

④ 见《女史逝世》,《中外日报》1902年6月30日。

⑤ 关于吴芙的生平考证见笔者《经典阐释中的文体、性别与时代——晚明与晚清的〈女诫〉白话注解》,《中国文学学报》第1期,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无锡白话报》刊行时,她刚刚虚龄十岁。所留下的《女诫》俚语本乃是清抄稿本,封面左侧有大字“女诫”,下接小字“吴芙俚语本”,右侧下方又有“无锡白话报馆置”的题记,说明此本应为《无锡白话报》的存稿。^①而所谓“俚语”,即是无锡方言。根据其父创造豆芽字母、教会家人的传奇经验,十岁的吴芙也可以尽早提笔为文,且其《女诫》俚语本中,亦不乏将“写弗出个字”用“等韵简马[码]”即家传的豆芽字母填写之处。因为这些字母排印上的麻烦,更重要的原因应该是无锡方言书写与《无锡白话报》提倡官话写作的立场相左,所以,此本并未在该刊登载,吴芙也只完成了《〈女诫〉序》的注解与翻译。

与《无锡白话报》之吴芙序相对应的一段文字,出自《女诫》俚语本第一段“吴芙说道”,属于注释者在文字疏解与白话译文之外,独立发表意见的空间,体现了晚清女性在经典注解中的主体意识。而这篇文字由于“五四”以后周作人的引用,在学界颇为人知晓。周氏所持为一种批评的态度,他认为,晚清的白话文和现代白话文“话怎样说便怎样写”不同,“却是由八股繙白话”,举证的例子即包括了吴芙为裘毓芳《〈女诫〉注释》所作序的开篇部分:

梅伯做成了《女诫》的注释,请吴芙做序,吴芙就提起笔来写道:自古以来女人,有名气的极多,要算曹大家第一……

周作人因此断言:“这仍然是古文里的格调,可见那时的白话,是作者用古文想出之后,又繙作白话写出来的。”^②不过,吴芙俚语本的发现,让我们可以还原真相。

“吴芙说道”其实是这样开始的:

自古以来个女人,有名气个极多,要算曹大家第一。曹大家是女(人)当中底孔夫子,《女诫》是女人最要紧念底书,真真一字值千金,要一句句想想,个个字味味。依了《女诫》底说话,方才成个女人。

所以,见于《无锡白话报》那几句被周作人专门摘引的穿靴戴帽的话,吴芙的俚语本中原来并不存在。添加的人应该是该刊编辑,很可能即为裘毓芳。

《无锡白话报》的文本乃是将吴芙的无锡话全部改写成合乎报社要求的官话。像上述第二句中的“个”改为“的”,便是常例。两相对照,多数文字没有大改动,如:

况且曹大家会做皇太后个(的)先生,会替哥哥做书。就要想着我是女人,他也是女人,他(就)万古留名,贤慧到如此;我就依依袅袅,眼孔小到像绿豆:做小姐单晓得(知道)衣裳首饰,争多嫌少;做媳妇单晓得(知道)吃老官(靠着丈夫吃),著老官(靠着丈夫著);也弗(不)晓得(知道)天东地西,也弗(不)晓得(知道)古往今来。

上述引文中,黑体者已经官话本改动,括号里的字即为改写或添加的部分。报社方面所做

① 此稿本现藏上海图书馆。

② 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第98—99页,北平:人文书店1934年版。